



2021.3.8 星期一 编辑:于大勇 (010)68667266 转247 E-mail: Geqp@chih.org.cn 组版:王新明

奋斗新起点 脱贫攻坚成果要衔接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刘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阶段,如何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握紧“接力棒”,跑好“新征程”,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并纷纷建言献策。

平稳过度是“关键”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召开。同一天,“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这也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早有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久前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设立5年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要求,关键是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中形成的重大成果,并推动其制度化、长效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创新模式和提供政策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陈春芳说,她的家乡灵寿县原来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期内,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累计减贫4.3947万人,12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由16.3%降至零,该县于2019年5月整体脱贫摘帽。

“作为基层代表,我深知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如何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的一项重大课题。”陈春芳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需要在脱贫攻坚建立的体制机制基础上,汇聚更强大的合力来推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各项措施落实,实

现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播下了‘试验田’,脱贫攻坚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为乡村振兴所借鉴。”在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看来,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统筹推进体制机制衔接,将脱贫攻坚一整套有效机制办法与乡村振兴“打包配套”。

产业提档是“动力”

“十三五”时期,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粮食年产量连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

“在脱贫攻坚重心转移到乡村振兴之际,脱贫的基础比较脆弱,脱贫群众遇到风险仍有返贫可能。补齐人才短板,丰富扶贫模式、扶智更扶志等都将考验脱贫攻坚的成色。”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告诉记者,让贫困户掌握自我生存的能力,是能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

“扶贫先扶志。要让贫困户摆脱脱贫攻坚中的路径依赖,让农户‘生财有道’,引导他们依托土地资源,发展农业产业,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才能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的富裕之路。”秦荣生说。

潘碧灵认为,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培育和发展乡村产业至关重要。为此潘碧灵建议,要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化规模农业和特色绿色产业,开发农林特产优势资源及精深加工,发展生态旅游和民宿旅游等培育壮大乡村产业。

促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风莲表示,希望国家层面在农村项目、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给予恰当引导。待全国两会结束后,她将邀请相关专家给大寨村把脉问诊,确定新的发展方向。

多位代表委员还提议,要深化东西部地区协作、着力破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与治理等问题,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无缝衔接。

培养人才是“核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攻坚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三农”工作成效。农村不现代化就留不住年轻人,没有年轻人就没有人从事农业。在由脱贫攻坚转入乡村振兴的路上,更少不了人才的支撑。

“推进乡村振兴,目前缺少人才,尤其是缺‘能人’,比如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和致富带头人。”潘碧灵建议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致富带头人培育、干部培训等政策制度,延伸推广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来,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人才匮乏和年轻人的流失是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在乡村振兴的新格局下,对人才的需求从技术农民向更加多元的新农人方向发展,如何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如何培养更多元、更高级的乡村振兴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有不少农业大专院校。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里的收入远高于农村,很多人把跳出‘农门’作为主要奋斗目标,近70%的农业类毕业生转行从事非农产业,这对乡村振兴战略来讲是巨大的损失。”刘永好建议,可通过补贴和配套条件建设,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计划,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针对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问题,秦荣生认为,可通过加强对返乡务工人员的培训来缓解这一难题。他告诉记者,他在对农村地区调研时发现,农村的人口红利正慢慢回归。

“随着现代智能机械化的发展,以前工厂、工地中所需的劳动力更多被智能机器人所代替,如今,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尤其是男性,更多返乡回到了农村。”秦荣生说,对返乡的农民工做好农业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培训,让他们可以在农村立业发展,对带动农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关键作用。

赵皖平:建立脱贫攻坚 成果巩固长效机制

▶ 本报记者 李洋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虽然脱贫攻坚战已然收官,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贫困县摘帽后群众生活仍不够富足,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还需筑牢基础。在履职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发现,在“三农”发展路上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特色产业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将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由于农业设施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盈利薄等原因,多数镇、村规模性特色产业难以形成。部分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但因宣传不足、开发不够等原因,整体效益欠佳。此外,刚脱贫的群众,生活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工作稍有松懈,就有可能重返贫困;一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因缺乏政策支持,也面临着各种复杂的致贫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难度也在加大。

为建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长效机制,赵皖平建议,要持续补齐“双基”建设短板。各级政府应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和其他相关行业部门资金,持续加大“双基”建设的投入,不断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环保、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养老服务 etc 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尤其是要补齐农业上的短板,通过硬化生产路、合理布置机井、疏通沟渠、补牢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方式,逐步破解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难题。要认真查补偏远地区的短板,重点关注以往政策关注少、有遗漏的地区,以非常之策予以帮助,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户。只有基础建设提升了,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企业投资,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要多措并举吸引劳动力回流。”赵皖平说,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家文化”,利用故土情怀唤醒暂时沉睡的乡愁或者让乡愁愈发强烈,从而激励外出人员回家乡投资或回乡就业。出台宽松政策,加大对回乡创业和外来投资人员的扶持力度,在贷款、税收、用人、用地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增加本土就业岗位,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开展乡风文明建设、

移风易俗专项行动,坚持不懈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稳步实施农村污水处理、改厨、改厕、改畜圈等整治工程,健全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和谐稳定,为回乡人员创造舒心环境。

同时,防止脱贫攻坚“悬崖效应”。赵皖平认为,要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既不吊高胃口,也不降低标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当合理布局、合理规划,避免出现“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二是坚持“扶贫扶志”教育,合理利用农村传统宣传方式,通过广播会、群众会等方式,持续宣传“扶贫不扶懒”的政策导向,对思想觉悟高、勤劳肯干的群众给予政策倾斜。三是出台约束制度,要对享受国家兜底保障的困难群体,从购房、购车、休闲娱乐、高档次消费等方面进行合理约束。四是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消除或基本消除不同群体在基础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等政策上的差异,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全面增强群众的风险抵御能力;缩小不同群体在产业、就业方面的扶持力度,建立并宣传好一般群众产业发展、本地就业方面政策,促进本地产业集聚发展。

在强化服务力促产业兴旺方面,赵皖平建议,要加强与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通过测土配方、选种育种,从“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如何销”等方面对广大农民予以指导。对设施农业实行统一登记、确认物权、审核发证,引导银行为农业企业提供抵押贷款,政府设立流动融资基金为农业企业提供过桥贷款。聚焦优势产业,重点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积极申请“地理标志”认证,打造区域农业产业品牌。深入挖掘,整合资源,结合当地民俗、产业特色,丰富乡村旅游内容,让游客来有的玩、有的看、有的吃、有的带、有的住;规范旅游产品、旅游服务市场的秩序,统一建设商业街,加强对居民的服务水平的培训和管理,营造良好环境,吸引游客,提高效益,助推旅游扶贫项目发展。同时,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培育有知识、有技术的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继续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适当提高粮食价格,稳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群众利益。

让“数字”下沉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 本报记者 刘琴

当前,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如今,乡村振兴战略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认为,疫情后更加凸显出数字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乡村振兴更应该借助数字化的力量。

城乡间“数字鸿沟”依然凸显

近几年,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我国农村与城市“同网同速”的时代正在到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席周桐宇告诉记者,她在调查中发现,城乡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数字服务使用鸿沟。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其使用数字服务是全方位、深层次的,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得生活与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并以此产生收益;而对于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虽然已通过手机接入移动互联网,但最常用的功能是通信和娱乐,常用的数字工具类APP离他们颇为遥远,即使安装了也很少使用。”周桐宇说。

截至2020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2.3%,受山区地形、设施密度、配置高低等影响,农村网络速度和网络质量不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实现了地级以上城市5G网络全覆盖,但乡村环境人口密度低,短期内还无法采用与城市5G覆盖相同的热点密度部署覆盖,仍是5G盲区。

“必须看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仍面临着顶层设计缺失、资源统筹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区域差异明显等诸多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表示。

全面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农民对数字技术的需求更迫切,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也

更大。为此,周桐宇建议,总结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模式,作为全国“样板”向其他地区推广,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

“数字”下沉 为农村发展迎来新机遇

,虽然数字技术在农村的渗透还不足,但近几年,数字技术的下沉也引发了就业下沉,为县域服务业打开了吸纳就业的新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滁州市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大学毕业后扎根基层至今已经8年。近几年,“数字乡村”“新基建”是她建议中的高频词。今年,她继续关注乡村的数字化建设,把以数字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支持数字技术企业参与到农产品创新两个建议带上全国两会。

数字化将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疫情发生后,数字化对全社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农村也不能落后。王萌萌举例说,数字化对新农村的作用之一是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数字技术下沉创造了新岗位,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谈到数字化为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多次深入农村调研的周桐宇也深有感触:“在数字化的助力下,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为大型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做客服的机会越来越多。”

周桐宇介绍说,全国农村种粮大户能通过手机,将土地的LBS定位发送至卫星,网商银行根据卫星回传的种植面积、作物类型、作物成熟度等信息决定放贷额度,贷款还能随借随还。她举例说,江西的一位农民刘迎锋通过网商银行的卫星贷款将承包的土地从几百亩扩大到上千亩,在老家种田的收入是他和爱人在城市打

工收入的四五倍。

随着数字化在农村的应用,我国更多县城、乡村的居民也能享受足不出户依然能用手机办事。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底,全国已有400多个县域在支付宝上设立“数字市民中心”。缴社保、查公积金、养老金认证等不用跑社区,线上就能搞定。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0年和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连续提出“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更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当下,我国网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数字经济如火如荼,缩小城乡数字差距亟待解决。要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数字科技是其腾飞的重要引擎。”周桐宇说。

随着移动智能终端在农村的普及和农村电商的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迎来重大机遇。在王萌萌看来,近年来电商消费的进一步下沉,“最后一公里”物流日益普及,农村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加速推进。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数字乡村”大有可为。周桐宇说,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石构建数字乡村,能够帮助农民提供精准的种植销售信息,助力政府精准决策,拓展农产品销售,助力地方产业重构,供应链畅通,价值链提升,全面打造数字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连玉明认为,加强数字乡村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配套,系统规划和超前布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

秦荣生:破解农村贷款难 设立“中国乡村振兴银行”

▶ 本报记者 刘琴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潮中,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在农村县域地区设立一家专门、专业服务乡村振兴的‘中国乡村振兴银行’是最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明显。在秦荣生看来,金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金融机构应以破解“三农”发展不充分作为工作的重点,围绕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秦荣生在调研时发现,近年来尽管各种金融机构纷纷向“三农”县域下沉服务重心,但广大农村地区“贷款难”“贷款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广大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据统计显示,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在县域都设有营业网点,其中仅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乡镇设有网点,但网点覆盖率均不足20%。”秦荣生介绍说,目前农户贷款服务覆盖率也较低,距满足农民金融需求差距较大。例如,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农户贷款户数388.84万户,农户贷款余额4352.67亿元,贷款服务仅占全国7亿农民人口的1.91%。

秦荣生表示,在农村地区,由于广大农户经营情况复杂,且居住相对分散,金融机构的调查人员往往很难将农户的情况调查清楚,导致金

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而减少农村业务。

针对性解决农村农户“贷款难”问题,秦荣生建议,单独设立“中国乡村振兴银行”,该银行可以设立总行和省级管理总部,在县域地区设置分行,在乡镇设置支行。其定位是非商业性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负责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各领域的金融服务供给。

按秦荣生的构想,“中国乡村振兴银行”是一个系统性的安排。他提议,应以新设立的“中国乡村振兴银行”为主体,整合现有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源,划拨并建立新的政策机制。例如将中国农业银行全部县域支行划转至“中国乡村振兴银行”总行,而不是另起炉灶,此举有利于利用现有金融机构的科技和系统优势,使相关机构、人员、机制、政策等方面尽快到位。

秦荣生认为,“中国乡村振兴银行”应为乡村振兴提供低利率、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他还呼吁各级政府能够配套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持“中国乡村振兴银行”做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服务。例如在国家层面,匹配专项信贷规模、专项风险管理策略;在地方政府层面,通过贷款财政贴息、建立风险补偿分担机制、协调人民银行再贷款资金支持等方式,为“中国乡村振兴银行”扎根乡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持。